

第一章 臺灣對傳統文化認知錯位與 民眾認同危機

根據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理論，「臺灣主體意識」的想像，是一種歷史與現實、殖民與反殖民、政治與文化、民族與國家等相互滲透的複雜的歷史過程，因而需要從中外古今四方對話的歷史語境來展開解析。

第一節 日本殖民對臺民眾身份認同異化

1895年甲午戰爭後，臺灣被迫切割，從中國母體分離出去，遭受半個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使臺灣社會的發展道路、臺灣人羣體的國家認同和羣體記憶都深度融入日本元素。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臺灣民眾國家認同問題的產生，其根源在於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如果沒有這段被殖民的痛苦經歷，也就不可能產生所謂的臺灣民眾國家認同問題。

一是語言切換帶動文化身份認同轉變。美國加州大學哈里·艾克斯坦（Harry Eckstein）提出兩種類型的文化變遷，在情境與結構的變遷中，會出現文化的不連續性（cultural discontinuities）。他把文化不連續性與社會不連續性聯繫起來考察，認為諸如在發生戰爭、新政體的形成等社

會動盪時，這種社會創傷或社會斷裂，就會造成文化上的後果。¹ 日本殖民期間，在島內全面推行「皇民化運動」，強制推行日語，禁用漢語，在文化上「反華仇中」，使得中華文化在臺灣遭受嚴重壓制和摧殘，直接造成了「文化不連續性」。據1944年臺灣「總督府」調查，當時日語普及度高達71%。² 語言的重要性並不僅僅在於語言本身，更在於語言背後更深層的文化結構。喬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曾說：「不論是精神分析學還是結構人類學，即發現不論是個體的無意識深層結構還是種族的文化深層結構都具有一種類似語言的結構」。³ 語言從世界範圍來看，會對一個民族的發展產生強有力的凝聚力。⁴ 日本在臺灣殖民期間大肆推行日語教育，不但隔斷了臺灣與大陸文化連接的臍帶，削弱了該時期中華傳統文化在臺灣的傳承，更是對這一時期成長的青少年思想產生了極為嚴重的負面導向作用。文化認同與民族認同、國家認同也有着密切的聯繫。根據建構主義「由文化確立規範—由規範確立認同」范式可以得知，文化因素對於一個國家、地區或民族成員的行為可以產生規約效應，而普通和被廣泛接受的社會規範又有助於建構對國家或民族的認同。美國學者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認為，文化認同是國家認同的起始和終點，更是民族主義的核心。⁵ 以1895年臺灣割讓予日本為時間節點，臺灣人的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逐漸與祖國發生分離。部分臺灣民眾親日意識濃厚，根深蒂固，也造成了臺灣民眾對中華傳統文化的離心傾向。

1 Harry Eckstein, "A Culturalist Theory of Political Change", in *Regarding Politics: Essays on Political Theory, Stability and Chan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231.

2 陳耕：《臺灣文化概觀》，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頁。

3 [美]諾姆·喬姆斯基著，牟小華、侯月英譯：《語言與心理》（序言），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頁。

4 [美]布龍菲爾德著，袁家驊等譯：《語言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78頁。

5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Las Vegas: University of Nevada, 1991, p.52.

二是滋生「日本身份認同優越論」。日本在臺灣強行推行日語教育的同時，對島內民眾的身份認同也不斷「洗腦」，利用手中的統治權，向民眾灌輸「日本代表現代文明、中國代表傳統文明」「日本代表優勢文明、中國代表劣勢文明」的意識。甲午中日戰爭日本獲勝、中國戰敗的結果，日本持續倡導灌輸，以及對先進文明文化學習的渴望，使得部分島內民眾對「日本優越論」深信不疑。在日據殖民時期一部分臺灣人表現出對先進文明學習的渴望，以非暴力鬥爭的方式進行反抗，也有部分臺灣人由於作為被殖民者自身極度自卑的心理，認為殖民國家的文明是先進的而自身的文化是落後的，當時的一部分本省籍精英由於對殖民國家的崇拜感和對原本自己祖國的自卑感異化了其身份認同，轉而接受日本文化認同。這也逐漸推動臺灣民眾形成新的共同體想像，認為「作為日本人要比作為中國人更為驕傲」，當這種意識在島內逐漸瀰漫開來的時候，這就意味着中華共同體的衰退。而當日本戰敗、放棄臺灣的時候，島內部分民眾對於日本的認同又出現了動搖，此時的臺灣民眾在認同方面開始出現一定的真空狀態，這也為包含「相對化」和「領土化」意涵的「臺灣意識」的出現和興起提供了重要條件。

三是島內抗日情緒滋生「臺灣本土意識」。日本殖期間，在清政府軟弱無能無法提供任何援助的情況下，臺灣人民對日本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頑強鬥爭，並在對日鬥爭中進一步強化了臺灣的內部認同。而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逐步興起了「臺灣本土意識」。這一階段的臺灣「本土化」運動，是以臺灣的本土意識抵抗日本的殖民侵略為核心目的，是中華民族文化中「愛國愛家」意識的體現。但不幸的是，隨着這種「臺灣本土意識」的逐漸發酵以及後來較長時期與大陸的分裂隔離，使得臺灣的「本土意識」開始進一步膨脹。例如「臺獨」分子史明就曾坦承，他是在1947年抗日鬥爭時，第一次有了「臺獨」的想法。從文化社會學的「文化突變」概念來觀察，史明的這一想法在當時頗有「突然變異」的意味。

時至今日，以民進黨為代表的島內分裂勢力在歷史敘述中刻意突顯日本殖民時期對於臺灣現代化的推動作用，選擇性遺忘日本在臺灣歷史中最為黑暗的一面。但這種選擇性歷史敘述也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讓很多臺灣青年對那段日本蹂躪臺灣的歷史完全一無所知，甚至有臺灣青年無知地叫囂「慰安婦是自願的」奇談怪論，這種論調固然讓人感到悲哀，但更悲哀的是背後民進黨等對日本殖民臺灣史的美化和重構。

第二節 兩蔣時期對兩岸文化話語權爭奪

一是「國語」新生與兩岸語言分歧。1945年臺灣光復，隨之開展的推行國語運動，被當作一場復興中華文化的社會運動遍及全臺灣。1945年官方擬訂的《臺灣接管計劃綱要》，首先一條即是「國語普及計劃」。當年11月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委派了魏建功、何容等專家抵臺開展推行國語的工作。「國語」被帶到臺灣以後，在一個與大陸隔絕的環境裏獲得了新的生命。此後幾十年，國語作為標準語在臺灣普及並扎根。臺灣又通過大力開展的華語教學把「標準國語」推行到廣大的海外華語圈。國語在臺灣向內向外的推行表明，國語一直「在位」，與大陸出自同源的普通話在各自的空間裏發展成長，共同薪傳着中華文化傳統。但兩岸由於歷史原因，同一種語言長期在相互隔絕的空間裏發展演變，原本共同使用的標準語在語言各層面都產生了差異。僅以詞彙層面為例，20世紀50年代以後，兩岸通用語詞彙相對30—40年代的國語都有巨大的變化，兩岸語言生活中分別產生的大量新詞語，包括新生外來詞、新吸收的方言詞以及在大陸已經沉寂罕用但在臺灣仍活躍的文言詞。在「一語兩話」的視角下，兩岸通用語詞彙系統的「交集」（漢語中的傳承詞）和「差異」（兩岸新生詞語）共同構成了現代漢語通用語詞彙的豐富集合。

從語言作為文化載體的角度來看，兩岸詞彙中被視為差異成分的新生部分，也是漢民族共同文化成長的語言表現。

二是反國民黨政治鬥爭滋生反華意識。1949年蔣介石退踞臺灣之後，一面強調臺灣「繼承中國正統的合法性」，一面又進行所謂「反共」教育，這本身就為「反中國化」和「反華意識」的滋生提供了一定的土壤。¹此後，隨着西式民主思潮在島內的興起和傳播，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合法性遭到質疑和反對，國民黨所推行的「中華文化復興」也遭到了抵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島內早期對於中華文化的對抗，其對抗的目的並不在於文化本身，而在於反對國民黨。但無論怎樣，這種對傳統中華文化的抵制，最終的結果卻是臺灣民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逐漸疏離。

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出現的所謂「文化本土化」運動，這也加劇了臺灣文化的斷裂。70年代發生「鄉土文學論」，80年代發生「臺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論戰。臺灣學者楊儒賓認為，「當有一個非共識的『中華文化』『中國』進入島嶼時，一個對照面的『臺灣文化』『臺灣』就不可能不產生」。²有人認為，「中國文化是國民黨的統治工具」，主張「臺灣文化」要與「中國文化」劃清界限。蔡英文曾經指出，國民黨提倡「中華文化」，「當大家對國民黨的政權、威權性格產生反感的時候，無可避免地對『中華文化』這四個字也有反感」。³從70年代開始，「獨派」知識分子與李登輝、陳水扁當局極力推行「去中國化」，企圖建構「臺灣文化民族主義」，即建構一個與中華文化不同的所謂「臺灣文化」，直至製造「臺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斷裂。這種圖謀雖然遭到失敗。但是「去中國化」的影響不可忽視，有人指出，它造成「臺灣居民複雜曖昧的

文化身份，表露於臺灣介於中國與日本間，文化認同的矛盾狀態」。¹還有人指出：陳水扁當局編寫的歷史教科書「期待能栽培出新一代的『臺獨』順民，期待大陸和臺灣的歷史文化聯繫從高中生的意識裏斷裂」。

三是「中華文化之根在臺灣」論調加劇兩岸對立。20世紀60年代末，臺灣成立「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連續出版諸子百家經典，帶動了民眾傳承弘揚中華文化的熱潮，客觀上促進了中華傳統文化在臺灣的發展。島內主流民意認同中華文化，國民黨的策略是以所謂「中華文化正統」自居，²竭力爭奪「中華文化正統話語權」，否認中華文化根在大陸，認為只有臺灣是唯一接續、傳承和弘揚了中華文化，是「中華文化領航者」，³只有臺灣才是「保留中華文化精髓的寶地」。⁴馬英九曾在多次公開講話中表示要大力培養展示、提升臺灣的「軟實力」，指出「文化是臺灣的關鍵實力，臺灣的教育水平、人民素質、公民社會、藝文創新，明顯地領先華人世界，是臺灣最大的資產」。馬英九強調臺灣在「保存中華文化」和「創造臺灣精神價值」這兩個方面有優勢，以此與大陸相比較，用以顯示他們在文化上的領先地位，並與大陸文化相區別。

馬英九上臺以後推行的「臺灣特色中華文化」。馬英九指出，「臺灣特色中華文化有三個特質：一是公民素養植根最深厚；二是傳統文化保存最完整；三是傳統與現代的銜接轉化最細緻」。它是「中華文化與臺灣本土文化結合」，又是「臺灣人用臺灣的空間，用臺灣的人力，發展出一

1 楊開煌：《新局：對胡六點之解讀》，中國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年版，第231—232頁。

2 楊儒賓：《臺灣的創造力與中華文化夢》，《思想》（臺灣），第25期，2014年5月。

3 馮耀明：《在臺灣談中華文化》，《思想》（臺灣），第25期，2014年5月。

1 陳麗文：《文化的斷裂與延續：以臺灣社會為例》，《空大人文學報》（臺灣），2007年，第16期。

2 例如，臺灣將該地區推行的、未被簡化的漢字稱為「正體字」，背後即是對「正統」的想像性認定。

3 《馬英九要臺灣做中華文化領航者：我非漢武帝》，新浪網，<https://news.sina.com.cn/o/2011-10-08/084923267470.shtml>。

4 《臺自認中華文化正統，設書院爭文化論述權》，騰訊網，<https://news.qq.com/a/20111101/001484.htm>。

個豐富中華文化的模式」。這種文化既與「獨派」排斥中華傳統文化的「臺灣文化」相區隔，又與非臺灣人建構的大陸文化相區隔。換句話說，既要與「獨派」的臺灣文化斷裂，又要與大陸文化斷裂。

時至今日，臺灣因為自身的局限性，希望在經濟上貼靠大陸，但在文化上則仍然有人自視「優越」，自認「唯有臺灣，最有條件成為中華文化的領航者」，「臺灣經驗應可作為中國大陸未來發展的借鑒」。馬英九大陸政策的實質，就是要以所謂「臺灣模式」引領大陸發展，在兩岸統一前維持兩岸「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

一種意識的產生多半是通過語言和文字來進行啟發和傳播，「臺灣主體意識」的產生也不例外。相較於中國大陸推行的簡體字，臺灣堅守着正體字即繁體字。如果按照佐哈爾（Even-Zohar）多元系統理論，所謂「正體字」本身其實就蘊含着一一定的價值判斷，認為臺灣堅守的才是「正（確）」的，代表着中華文化的「正統」，是當代中華文化的「中心」，而中國大陸的簡體字自然就是「不正」的，只是中華文化的「邪道」，在當代中華文化當中只處於「邊緣」地位。很多臺灣民眾都認為，由於中國大陸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特殊的歷史時期，傳統文化遭受浩劫，相對而言，以仁義禮智信為代表的傳統價值觀在臺灣保存得相對完整。通過這種方式，部分臺灣民眾就對大陸產生了一定的優越感以及背後的區隔感。

第三節 分裂勢力執政時期的「文化臺獨」

「自古以來，語言文字問題始終關係到國家和民族的主權」。¹ 近現代歷史中語言民族主義引人注目，它起源於歐洲，擴散於世界。語言民族

1 參見許嘉璐先生為《國家、民族與語言——語言政策國別研究》所做的序言。參見周慶生主編《國家、民族與語言——語言政策國別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 頁。

主義既具有整合建構性功能，也具有解構分裂性效應，在歐洲民族國家形成中扮演過重要角色，也在亞非國家後殖民時代發揮過重要作用。當代分裂型語言民族主義尤其活躍，且形式多樣，與其他類型分離主義聯繫複雜，但本質相同，均以分裂分離為訴求。以語言民族主義為參照，近二三十年來，臺灣的分裂勢力也在多元文化主義的旗號下利用語言問題推行其「臺獨」主張，刻意突顯臺灣漢語與大陸漢語的差異，「化同為異」，「由同趨異」，試圖分離、切斷臺灣與大陸的語言文化聯繫，扭曲臺灣民眾的文化認同與民族認同。李登輝和民進黨圖謀推動臺灣內部文化「排中性」的加劇演進，路線圖是由「語言臺獨」過渡到「文化臺獨」再邁向最終的「政治臺獨」和「法理臺獨」。

一是將臺灣語言納入南島語系而非漢藏語系。語言在作為表情達意的工具、思維思想的載體的同時，也是人們所屬羣體的重要認同標記，是個體之間和羣體之間區別異同的重要標識，因而具有身份和認同的辨識與表現功能，即所謂「族羣識別 / 認同功能」。因此，「語言往往成為民族政治訴求中的重要內容，在民族主義運動中起着對內喚醒民族意識、凝聚民族向心力，對外同其他民族相區隔的重要作用。」¹ 陳平教授把這種以語言為工具的民族主義政治理念與活動通稱為語言民族主義（linguistic nationalism）。² 「它以語言為手段，凝聚和強化本民族的民族意識，增強民族成員之間的認同感，並以此為基礎建立或鞏固以本民族為主體的現代民族國家。」³ 語言民族主義及其運動就其功能而言可區分為兩大類型：即整合型語言民族主義及其運動和分裂型語言民族主義及其

1 陳平：《語言民族主義：歐洲與中國》，《外語教學與研究》2008 年第 1 期。

2 戴曼純、朱寧燕：《語言民族主義的政治功能——以前南斯拉夫為例》，《歐洲研究》2011 年第 1 期。

3 王瑩：《試論 19 世紀至 1945 年間的德國「語言民族主義」》，《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6 期。

運動；前者以統一民族語言為工具謀求民族解放或超民族共同體的構建；後者則發生在統一的多民族共同體尤其是一國內部個別族羣以語言為手段發動的民族運動，謀求分裂國家，達成自治甚至獨立的目的。¹ 由此可見，語言民族主義既具有民族國家的建構功能，又有分裂主權國家的解構效應，特別是近些年來，分離主義勢力中最常見的民族型分裂主義與語言關係極為密切。由此可以看出，語言政策的目的並不在語言本身，而在於政治，語言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的建構之間存在着密切的關聯。民進黨圖謀將本來只是社會學和人類學意義上的「族羣」(ethnic group) 概念通過政治闡釋，逐步演變成為純粹的政治學概念「民族」(nation)。臺灣地區原住民是指漢族遷居臺灣之前最早到達臺灣居住的族羣，曾被統稱為「高山族」。他們總人口約有 50 萬，雖然只佔臺灣人口的 2%，但是族羣多樣。根據臺灣地區「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正式認定的原住民族一共有十四個，分別為阿美族、排灣族、卑南族、泰雅族、鄒族、布農族、魯凱族、雅美族(達悟族)、塞夏族、邵族、太魯閣族、噶瑪蘭族、撒奇萊雅族和賽德克族。這些族羣所使用的語言均屬於南島語。南島語系在世界語言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的學術地位，但是臺灣長期的殖民歷史、不當的政治同化政策、經濟發展帶動的人口遷移等諸多因素使得這種語言現已處於瀕危狀態。2009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佈了《瀕危語言列表(List of Endangered Languages)》，其中臺灣原住民族語言就有 24 種。蔡英文反覆強調臺灣語言與南島語系的同根同源，其目的並不在於構建與南島語系的知識譜系，而是想藉此構建所謂的「海洋文明」來對抗以大陸文明為主體的中華文明。關於臺灣人的起源，施聯朱研究指出，臺灣高山族主要來自大陸古越人的一支，少數來自東北琉球羣島和

1 戴曼純、朱寧燕：《語言民族主義的政治功能——以前南斯拉夫為例》，《歐洲研究》2011 年第 2 期。

南方菲律賓、婆羅洲和密克羅尼西亞羣島，與早先遷入的古越人相互融合，逐漸成為今天的高山族。¹ 史賓塞博士的基因研究證明，臺灣原住民的祖先來自中國大陸。²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張海國領銜的國際研究團隊，經過 30 年的膚紋研究，發現臺灣少數民族中人數最多的「阿美人」和人數最少的「噶瑪蘭人」樣本，都聚落在北方中國人羣內，與「原住民源於海洋」的結論不同。³ 基因一致說再次證明了兩岸民眾生物學上的同源。臺灣原住民尚且主體都是來自中國大陸，臺灣九成以上的漢族同胞更無需多言，他們都是有史可考、有據可查的大陸移民。因而島內綠營勢力蓄意製造的「本省人」「外省人」的對立，其實是完全不成立的，他們只不過是從中國大陸去臺的時間有所前後而已。

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認為，民族語言基本上是人為建構出來的，在此過程中，政治意識形態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民族語言只是從各種不同的通行語言之中，精煉出一套標準化的對話方式，然後再把所有的通行語言降格為方言」。⁴「那種神祕的民族認同感加上柏拉圖式的語言觀，基本上可說是民族主義知識分子而非真實的語言使用者所建構的意識形態假像。」⁵ 民進黨刻意將島內原住民語言打上南島語系的目的，背後也是想構建一種與大陸切割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

二是將「臺語」與漢語對立化建構。民族語言是民族文化歷史傳承的紐帶，從漢語通用語近現代發展演變的歷史來看，兩岸都是以漢民族共同語為標準語。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凡搞分裂的人往往從語言下手，

1 施聯朱、許國良：《臺灣民族歷史與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70 頁。
2 「基因研究證實：臺灣原住民祖先確實來自中國大陸」，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2002-11-26/26/247112.html>。
3 《臺灣原住民並非源於南洋》，《文匯報》2010 年 1 月 22 日。
4 [美]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3 頁。
5 [美]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7 頁。

最流行的謬論就是聲稱臺灣用的「臺語」，相對漢語是另外一種語言。這裏的「臺語」等同於「本土語言」，包括閩南話、客家話和原住民族語。另外則有聲音稱，「臺灣國語」是大陸強加給臺灣的一種外來語言，竭力拆解中華文化共同體。陳水扁當年高調推出的所謂「臺語」，事實上只不過是福建一帶同胞帶到臺灣去的一種地方方言，即「閩南話」。從理論上來講，兩岸語言之間是「一語兩話」的關係，所謂的「臺語」只是一種方言而非語言，它更準確的表述應該是「臺灣話」，就和「湖南話」「四川話」一樣，只是一種充滿地域特色的漢語方言，而不是與漢語對立的自成體系的另外一種語言。

語言認同是族羣認同的重要屬性。許多分裂勢力就是通過分裂國家標準語運動和發起所謂母語運動，來確立區分異己的「自我識別」，¹謀求達到拆解民族主權共同體的目的。為構建「臺灣」作為一個民族的「主權獨立性」，島內分裂勢力也刻意效仿，將語言「臺獨」視為文化「臺獨」佈局的重要內容，將臺灣語言與漢語進行差異化對比，通過突顯與漢語的不同，來確立「臺語」的主體地位。在臺灣語言政策制訂和社會語言生活各方面，「臺獨」勢力在多元文化的旗號下極力推行「去中國化」，造成臺灣社會的認同危機。當島內綠營政治勢力在語言上都不想再認同漢語，反而精心構築「臺語」時，其背後挑動的「臺獨」思維也就昭然若揭。所以「臺語」運動表面上是一場所謂「文化思潮」，但更多是一種服務於「臺獨」意識形態的政治運動，嚴重影響了島內政治生態和民眾的文化認同。馬英九執政時期，針對民進黨執政時的「去中國化」語文政策，國民黨重新上臺執政後進行了不少撥亂反正工作，將閩南語、客家語及原住民族語由原來的「鄉土語言」更名為「本土語言」；使用漢語

拼音，放棄使用「通用拼音」。但在「臺語」文字方面，仍延續了民進黨的一些做法，¹導致「臺語」的危害一直延續至今。

語言民族主義運動本身就是將語言和政治相掛鉤的做法。臺灣某些語言理論研究直接或間接支持了「臺獨」的主張。近年來，臺灣的「臺獨」主張不僅表現在綱領性文件以及頭面人物的宣示上，學術界一些人也積極配合。多元文化主義被竊據為「文化臺獨」的理論基礎，也成為語言社會學研究的常用詞。還有些研究課題，以語言文化多元化為理論立場，圍繞語言人權的維護、多元化語言政策的制訂、母語教育的規劃等問題展開研究。由於沒有同「臺獨」相關理論劃清界線，其成果很容易直接或間接地被利用為「文化臺獨」的理論資源，迎合了「文化臺獨」主張理論化的需求。

三是將臺灣文化納入海洋文明來與陸地文明對抗。語言認同在範疇上應該歸為族羣認同（*ethnic identity*）的一種屬性。族羣認同是族羣成員對自己所屬族羣的身份認知和情感依附。根據族羣認同理論，基於共同語言、宗教、種族、族屬和領土的「原生紐帶」是族羣成員互相聯繫的因素，對族羣成員來說，原生性的紐帶和情感是根深蒂固的和非理性的、下意識的。臺灣一些人為了剝離臺灣地方文化與母語文化的血緣關係，提出所謂「獨立發展說」，認為「『臺灣國語』是個獨立自主的語言，固不必引頸西盼，也沒有什麼可引以為恥之處」。²臺灣綠營學者鄭良偉則認為，大陸的普通話屬於「規範取向類型」的大陸文化，而「臺灣華語」是在臺灣社區環境影響下逐漸衍變為具有「海洋文化類型」特點的語言，是臺灣所謂的海洋文化自然產生出的一種獨立的語言。³這一說法正好與

1 Jr, Curtis Ford, *The (Re-)Birth of Bosnia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Planning in Bosnian-Herzegovin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hD Dissertation, 2001.

1 戴紅亮：《臺灣語言文字政策》，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8 頁。

2 黃宣範：《語言、社會與族羣意識》，中國臺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2008 年版，第 72 頁。

3 鄭良偉：《臺語口語及書面語的活力》，載鄭錦全主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臺灣）「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2007 年版，第 42 頁。

「大陸屬於大陸文化，臺灣屬於海洋文化」的偽命題相呼應，旨在構建不同於大陸的臺灣文化格局。島內分裂勢力意圖建構「海洋文化」，並把中國大陸貼上「陸地文化」標籤，以此來突顯臺灣文化與大陸文化的差異，背後更重要的當然是為「臺獨意識」提供理論和文化支撐。

還有些綠營分子故意將臺灣文化與中華文化對立起來，過分強調臺灣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差異性，片面強調臺灣文化的本土性與多元性，提出「中華文化是臺灣文化的一部分」的謬論，明顯是將中華文化與臺灣文化的關係本末倒置。在文化層面上，重在消除中華傳統文化對臺灣地區文化的「束縛」，增強臺灣地區的「國家」意識，增進臺灣民眾的「國民」身份認同。於是，在本土概念和大中華概念兩者之間的意識鬥爭中，本土概念逐步成為共識性認知，強調本土意識、本土觀念的建構，「想像的共同體」「族羣」為主的新型價值體系逐步形成。近些年，臺灣的文化氛圍發生重大改變，其中文化政策、「國民」教育、社會結構等方面都發生重大的結構性變革，臺灣青年世代（「00後」世代為主）的集體認識、歷史記憶、政治認知、話語體系與價值觀念等的羣體特性逐漸改變，尤其是身份認同的多樣性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劇烈變化。

李登輝、陳水扁、蔡英文等故意將「臺灣意識」與「中國意識」建立一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關係。這種「你是你我是我」的異己思維將直接影響兩岸文化交流的成效，一旦在文化上將臺灣與大陸分裂開來，兩岸即使進行交流，也無法產生文化上的親情體驗，無法達到兩岸文化融合的目的。李登輝稱，「長期以來，在國民黨黨化教育下，臺灣人被灌輸『大中國意識』，臺灣歷史文化被打壓，臺灣人民無法真正認識自己的歷史文化，也因而無法確立對臺灣的『國家認同』。」

蔡英文「去中國化」舉措包含方方面面，主要有：清除臺灣社會中不利於「臺灣獨立」的中國文化，如淡化部分中國傳統節日，清理臺灣留存的重要中國文物。通過文化教育培養年輕一代抗中媚日的「臺灣史

觀」，藉以實現其所謂「天然獨」之願景，如廢止馬英九時期「課綱微調」等。為臺灣「正名」，將一些名稱與中國掛鈎的正式機構進行「正名」，比如將「中華奧委會」改為「國家奧委會」，以此強化「本土」意識。除了對「中華」有關字眼進行去除以外，蔡英文在教育方面做出重大「改革」，淡化學生對大陸歷史與文化的了解，希望通過公權力的操作規訓出一批能夠實現「臺灣轉型」的所謂「正義之士」。大幅度降低文言文內容，對孔子和鄭成功這樣對大陸、臺灣意義相同的歷史人物，甚至對孫中山和蔣介石這樣推動「中華民國」歷史的人物，都進行淡化處理。2017年的「雙十節」並沒有「中華民國」字眼，也沒有「青天白日」旗；2018年「二二八」事件紀念日，蔣介石棺柩被潑紅漆。2019年實施新修改的將中國史併入東亞史的「歷史課綱」。一系列「去中國化」事件，旨在培育更多年輕一代「天然獨」，妄圖形成歷史空白和記憶遺忘。

長久以來，中華民族身份認同之所以能夠歷久彌新、連續不斷，主要依靠兩大支柱，即傳統文化積澱和王朝權力統治。傳統文化積澱，主要為人們提供心理寄託和集體歸屬感，逐漸內化成為集體無意識，自覺本能地就認為是這個羣體中的一個分子。王朝權力統治特別是中央集權的王朝統治，則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維度裏控制着人們的想像，迫使人們只能循規蹈矩，遵守既定的民族認同，不敢逾越雷池半步。而就臺灣而言，由於荷蘭、日本等外族接連入侵以及中央王朝對當地實際控制影響力的式微，臺灣對傳統文化的歷史積澱出現了斷檔，對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自然也會出現斷裂。特別是自李登輝至蔡英文執政時期，臺當局在島內瘋狂推行「文化臺獨」路線，故意突出臺灣中華文化的特殊性，鼓吹「臺灣人是新興民族」「臺灣文化是新興文化」，把兩岸的中華文化對立起來，否認「臺灣文化是中華文化的分支」，主張以「國與國」定位

進行兩岸文化交流，¹ 試圖全面、系統地割斷臺灣與大陸的精神紐帶，抹去島內民眾的祖國記憶，從歷史觀、文化觀方面塑造臺灣民眾的「臺獨觀念」。民進黨以選舉為訴求，實施了「本土主義的身份政治」，也可被視為是「反應性身份政治」。民進黨搞「文化臺獨」的初衷是要將之作為政治操弄的工具，來為島內選舉服務，在這一過程中，「文化臺獨」順勢藉本土文化實現自我包裝，實現了由手段向目的這一形式上的轉換，以更好地履行其政治意圖。其所作所為危害了兩岸文化原生性聯結，破壞了臺灣的文化根基，腐蝕了島內民眾對中華文化母體的認同，也給兩岸的文化整合增添了阻力。

第四節 民進黨「語言臺獨」做法及危害

2016年民進黨上臺後，不斷利用公權力加速「文化臺獨」佈局，給兩岸關係發展帶來巨大衝擊。從2022年秋季學期開始，民進黨當局把「臺灣本土語課」設為中小學必修課，包括原住民語、臺灣各部落話和臺灣手語等。臺當局此舉用心險惡，意在藉「本土語言」加速落實所謂「去中國化」進程，扭曲島內民眾特別是青年羣體身份認同，為兩岸同胞心靈契合和兩岸統一之後的臺灣社會治理設置障礙，值得兩岸各界有識之士高度警惕。

一、主要做法

李登輝、陳水扁時期，臺灣當局在「臺獨」意識形態驅動下，就強

力推行「鄉土教材」，使臺灣教育逐步偏離中華傳統文化。2016年民進黨重返執政後，首次實現對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的「全面執政」，利用公權力大肆推行「語言臺獨」，其主要做法有：

（一）制定所謂「國家語言發展法」，加強制度性建設

陳水扁執政時期，就謀求利用語言來進行「臺獨」佈局，2001年首次拋出所謂「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草案」。2019年1月，蔡英文當局正式通過所謂「國家語言發展法」，成為臺灣各項語言政策的法源依據。民進黨籍「立委」丘議瑩叫囂稱，「這是歷史性一刻」。臺灣所謂「國家語言發展法」及其配套的臺灣「國家語言發展法施行細則」「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和「客家基本法」等，將使臺灣「本土語言」教學成為強制性行為。

（二）臺灣「文化部」扮演重要推手角色

臺灣「文化部」是「文化臺獨」的「大本營」，「國家語言發展法」就是其一手推動的。2021年8月，臺「文化部」聯合客家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部」等部門，召開首次所謂的「國家語言發展會議」。為了進一步從語言標識層面加速「臺獨」，臺「文化部」還準備把金曲獎「國語獎項」更改為「華語」，臺、客、原住民書面語將冠名「臺灣」。2021年1月，臺「文化部長」李永得聲稱，為尊重臺灣各族羣的語言，初步規劃將書面語正式名稱改為「臺灣臺語、臺灣客語、臺灣原住民族語、馬祖語、臺灣手語」。

（三）製造「國文浩劫」

為以「文化臺獨」為過渡向「事實臺獨」不斷逼近，民進黨當局費盡心機，多措並舉。

1 楊立憲：《臺灣社會對中華文化的態度探析》，《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第75頁。

一是生硬編造所謂「臺語文」，妄圖藉此與「國語」區隔，進一步突顯「臺灣獨立主體」假像。為了政策接軌，民進黨當局還專門設立「臺語文」電視臺，並將「臺語」與「母語」畫上等號，舉行所謂「母語日」活動，並通過各種比賽來推廣「臺語文」。

二是弱化「國文」位階。2017年9月，臺當局「教育部課審大會」決議將高中語文課程文言文比例調整為35%到45%，較之前的45%至55%下修十個百分點。韓愈《師說》、諸葛亮《出師表》等將淡出臺灣中學生課堂。臺考試部門還宣佈，自2023年起，島內公務員普通、高等考試等不再考公文。民進黨籍「立委」鄭運鵬稱，「年輕人不應該把青春浪費在古文上」。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在「媚日」情節驅動下，民進黨當局卻將日本人寫的古文變成必修。此舉意圖通過「滅其文」來磨滅臺灣年輕人心中的中華文化的痕跡，讓臺灣的年輕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三是加速「去漢語化」進程。臺灣從印度尼西亞、越南等國移民的「新住民」逾54萬，超越臺灣原住民人數，並孕育了41萬名後代，「新住民」總數已佔臺總人口3%以上。2019年8月起，民進黨當局新增泰語、印度尼西亞語等七國東南亞語為必修課，要求學生必須從這七種語言及所謂本土語言（臺語、客語或原住民語）中選一門必修。

四是將「臺語」打造為「臺獨語」。為達到割裂兩岸險惡用心，島內「臺獨」勢力把一些詞彙粗暴扭曲為政治道具，無視大陸仍有1600萬人使用閩南話，刻意將兩岸都講的閩南語視為獨有的「臺語」，並強行讓所謂「臺語」與血脈相通的閩南語脫鉤，將「臺語」打造為「臺獨語」。

二、主要危害

在民進黨當局塑造的政治語境裏，傳承「國語」就是「賣臺」，「本土語言」「臺人就要會講臺語」成為「政治正確」。綠營前「立委」陳柏

惟質詢官員時堅持講閩南話，搞成兩人對答必須用「翻譯」的鬧劇，在島內淪為世人笑柄。以「學術自由」自居的臺灣師範大學則給用閩南話授課的老師加薪，號稱「雙語教學」，讓島內民眾覺得匪夷所思。但這一系列鬧劇若愈演愈烈的話，長此以往下去，勢將產生嚴重危害。

（一）培養「天然獨」，洗腦青年人

臺灣「教育部」加速在臺灣大中小學的滲透，將「本土語言」列為基礎教育階段「必修課」和「部定課程」，並獎勵臺灣大專院校與研究機構開設「本土語言」相關課程。設置「表揚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鼓勵學者從事臺灣「本土語言」的研究和推廣工作，帶動全民提振本土語言傳承。臺灣「中華語文促進協會」祕書長段心儀指出，民進黨當局此舉是打着「本土多元」的旗號將「臺語」進行政治化操弄，是對語言教育的政治踐踏，更將會對島內青年羣體產生嚴重的誤導效應。

（二）臺灣民眾漢語言文化素養大幅下滑

民進黨當局不斷刪減文言文比例，稀釋中華傳統文化，勢必會降低臺灣社會文化底蘊，臺灣學子從過去小學生張口就是「講信修睦」到現在初中生寫出「劣祖劣宗」，語言水平明顯下滑。這在民進黨當局官員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例如，陳水扁稱讚臺灣志工的貢獻是「罄竹難書」。蔡英文在手寫「點亮臺灣」時，四個字中有三個字寫錯，而在春節期間為民眾所手書的對聯「自自冉冉、歡喜新春」中，錯字連連，文法不通，語意不明。臺前「行政院長」蘇貞昌、前衛生福利事務部門負責人陳時中等，也經常爆出錯別字醜聞。臺灣當局如此表現，必將產生負面示範效應，導致臺灣民眾對於語言文化重視程度下降，未來臺灣將遭遇社會迷失、價值沉淪和文化無根漂泊的困境，臺灣的文化軟實力和綜合競爭力也將大幅衰退。

（三）在關涉「家國認同」表述上出現嚴重錯位

民進黨當局將語言作為「國族」構建工具，利用推行「本土語文教育」異化民眾的國家認同，鼓吹「臺灣與對岸不是一個國家」。在民進黨當局「臺獨」意識形態洗腦之下，島內民眾對於「我國」「國家」等內涵和外延的認知出現嚴重錯亂，呈現出「臺灣國家化」態勢，少有「大中國的認知」，多認為其僅限於「臺澎金馬地區」，這種錯誤認知會加劇島內民眾的身份認同異化，助其強化「臺灣主體意識」甚至是「臺獨意識」。

總而言之，民進黨當局不斷以法律、政治等各種方式操弄「語言臺獨」，其背後最主要的險惡用心就是通過「語言」的方式來突顯臺灣的所謂「主體性」，放大兩岸之間的文化差異，藉此來扭曲和異化島內民眾特別是青年羣體的身份認同，為兩岸關係發展和兩岸邁向統一設置障礙。未來兩岸各界應該充分認清民進黨當局的險惡用心，推動兩岸各項交流，在交流與互動中破解民進黨當局的「語言臺獨」圖謀，使得廣大臺灣同胞充分認識到兩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種的客觀事實，主動攜起手來，與大陸同胞攜起手來，共同為傳承中華文化和實現民族復興而奮鬥。

第二章 臺灣政治生態對島內民眾文化認同的侵蝕

20世紀70年代民粹主義在臺灣興起之後，早期曾對臺灣民主轉型發揮過一定的助推作用，但隨着各種政治人物的持續操弄，民粹主義到李登輝時期開始呈現出典型的「民粹威權主義」特徵，在陳水扁和馬英九時期則逐漸往「民粹選舉主義」方向發展。蔡英文上臺後，作為執政黨的民進黨依然按照在野黨時的思維模式，頻頻利用民粹主義打擊異己，鞏固政治權力，但由於民粹主義反精英、反建制的內在特質，使得民進黨當局正面臨着民粹主義反噬的巨大困境。在全球民粹主義第三波浪潮和島內政治溫牀滋養的雙重因素影響下，民粹主義在臺灣將持續發酵，並將對島內政治格局、經濟社會發展和兩岸文化認同帶來新的變量，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節 臺灣民粹主義的政治演進及影響

民粹主義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學術界至今未形成明確和統一定義，它可以理解為一種政治心態或思潮，也可以是一種社會運動，甚至是政治策略。¹臺灣民粹主義則是伴隨臺灣政治轉型而逐漸興起的一種特

1 參見[英]保羅·塔格特著，袁明旭譯：《民粹主義》，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頁。

殊政治現象，既有民粹主義的一般特徵，又充斥着濃郁的臺灣地區自身特點，¹如臺灣的省籍、族羣以及統「獨」議題，以及與臺灣民主化進程相伴而生的「臺灣主體意識」以及民粹主義對兩岸關係的危害等，都是在討論臺灣民粹主義時無法迴避的重要問題。總體觀察，海內外關於臺灣民粹主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民粹主義概念的界定、民粹主義與民主化和本土化的關係、民粹政治的特點與走向等方面。²本節嘗試在充分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臺灣民主化進程及背後臺灣社會的政經互動為背景，對臺灣民粹主義在各個時期的歷史演變脈絡特別蔡英文上臺後所呈現的新特點與新走向進行深度剖析。

一、民主轉型與民主異化：臺灣民粹主義演進的歷史語境

從「總統直選」到公民投票，從反威權、反體制的社會運動，到李登輝時期的「威權民粹主義」，再到陳水扁時期的「選舉民粹主義」，再到當前的「反建制民粹主義」，每一個時期的臺灣民粹主義都是特定歷史條件和社會發展階段的產物，呈現出鮮明的時代性和政治性特點。不過，既有研究多聚焦於某一歷史階段的現象分析，缺乏對臺灣民粹主義興衰起落整體面貌的概覽，因而有必要首先以時間為脈絡，對臺灣民粹主義的演進歷程進行簡要梳理。

1 民粹主義一詞來源於拉丁語中的 *Populus*（羣眾），又被譯作「羣眾主義」「平民主義」。民粹主義現象最早出現於 19 世紀下半葉，此後逐漸成為進入主流政治的一種政治現象。由於民粹主義的模糊性和複雜化，學術界對其定義並不統一，一般分為歐美語境下的 *populism* 或俄羅斯語境下的 *narodnichestvo*。19 世紀的美國民粹黨、俄國民粹派，20 世紀中期拉丁美洲的庇隆和阿連德等人領導的民族復興運動、法國的布熱德分子，以及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玻利維亞總統埃沃·莫拉萊斯、法國女政治家馬琳·勒龐、荷蘭政治家基爾特·威爾德斯等，這些不同時期、不同國家、不同政治環境和主張的運動或人物都具有民粹主義特徵。多數學者認為，民粹主義是一種政治哲學，在概念上泛指一種反精英和反建制的社會文化思潮。

2 尹茂祥：《臺灣地區民粹主義研究狀況述評》，《臺灣周刊》2019 年第 13 期，第 16 頁。

（一）民粹思潮的濫觴與民主轉型的加速（1970 年代 — 1988 年）

在臺灣政治發展中，民粹主義最早被用來形容當時無黨籍政治人物的政治策略。黃紀在 1980 年的《聯合報》上發文稱，「在野的知識分子在尋求支持、擴大基礎的過程中，往往與新近動員的團體結合，走民粹主義的道路。他們一般都認為『樸實的農民』與『勤苦的勞工』具有淨化社會的素質，勞苦的羣眾才是對社會貢獻最大的人」。¹這裏的民粹主義較為中性，接近卡農範（Margaret Canovan）所說的農民民粹主義下的「知識分子的農村社會主義」。民粹與民主相伴而生，本來就存在着極為複雜的「同素異形」關聯結構。在臺灣當時的歷史語境中，民粹被賦予中性甚至偏褒義的意涵，為打破當時國民黨在臺灣以「戰時動員戡亂體制」為代表的「白色恐怖」注入了強大動力，也為臺灣正式開啟所謂「民主化進程」撕開了一個重要缺口。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對於臺灣民粹主義的評價和定位，不宜完全以當下學術界慣用的貶義色彩和「污名化視角」來審視，而應看到民粹主義在臺灣早期民主化進程中也曾經發揮過重要的「催化劑」和「加速器」功能。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臺灣早期的民粹主義包含了民主的合理基因，但它卻沒有對臺灣的「民主化進程」發揮正面助益，這一方面是由於民粹主義本身具有的投機性和破壞性，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民粹主義與臺灣特殊的省籍、族羣矛盾相伴而生，並在島內尚未成熟的公民社會和民主體制中產生異化，造成了「民主異象」。

（二）李登輝時期的「民粹領袖」與「民粹式民主」（1988 — 2000 年）

1988 年李登輝上臺之初，面臨着根基較淺、權力不穩的困境，選擇以「民意授權」為幌子，以「本土化」與「臺灣人」的政治符號為價值

1 黃紀：《無黨籍人士的競選言論策略》（下），《聯合報》1980 年 12 月 1 日第 2 版。